

智能算法驱动下青年价值引领的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

蔡蕊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重庆 400065)

摘要: 智能算法重塑了青年价值塑造的现实图景, 在提升引领精度效度的同时也引发了深层困境。智能算法内嵌资本逐利、技术偏好与工具理性三重逻辑加剧了信息茧房、泛娱乐化、算法权力扩张与即时满足成瘾的交织共振, 使青年价值认知呈现“窄化”与“偏化”、价值认同陷入“轻化”与“虚化”、价值选择面临“物化”与“从化”、价值践行则出现“韧性”不足与行为“退化”的现实困境。为破解上述难题, 需要构建“技术向善—制度规约—主体赋能”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格局, 提升算法时代青年价值引领实效性与方向性。

关键词: 智能算法; 价值; 价值引领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 年度一般课题“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思政课数字化教学的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K23YGG2160403)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31

Practical Dilemmas and Solutions of Youth Value Guidance Driven by Intelligent Algorithms

Cai Rui¹

¹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Intelligent algorithms are reshaping the landscape of youth value formation. While enhancing the precision and efficacy of value guidance, they have also precipitated profound dilemmas. Driven by the triple logic of embedded capital profit-seeking,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se algorithms exacerbate the interplay of information cocoons, pan-entertainment, algorithmic power expansion, and instant gratification addiction. Consequently, youth value cognition faces "narrowing" and "deviation"; value identity suffers from "trivialization" and "hollowing-out"; value choices confront "materialization" and "conformity"; and value practice exhibits insufficient "resilience" alongside behavioral "regression."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it is imperative to construct a tripartite systemic framework integrating "technology for good,"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 and "subject empowerment" to bolster the effectiveness and directionality of youth value guidance in the algorithmic era.

Keywords: Intelligent algorithms; Values; Value Guidance

当今时代, 智能算法日益融入社会生活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 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青年作为网络原住民, 他们的所见所闻、所喜所恶、所信所疑, 无不在智能算法的隐性调配中渐次形塑。然而, 智能算法并非冰冷的“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 而是重塑青年获取信息、建构认知、形成判断的重要性“价值变量”。它以偏好迎合为运行逻辑的推荐机制, 在选择性放大某些价值光谱的同时, 又系统性地遮蔽另一些意义向度。由此催生的深层悖论在于: 智能算法推荐在提升信息分发效率、满足个体偏好层面的“精准”与“高效”, 也构成青年价值引领“提质”与“铸魂”要求的根本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为此, 本文立足于智能算法重塑青年价值生态的现实图景, 揭示智能算法驱动下青年价值引领面临的多重困境, 并积极探索应对之策, 以期对数字时代青年价值观培育的理论深化与实践突破提供参照。

一、智能算法驱动下青年价值引领的运行逻辑

智能算法为何从一种技术工具演变成能够深度影响青年价值观形塑的力量? 回答这一问题, 首先需要我们透过技术的表象, 揭示其运行机理, 方能明晰智能算法作用青年价值观的底层逻辑。

(一) 资本逐利逻辑对铸魂育人逻辑的僭越

在智能算法开发和运作的实际场域中, 它以资本逐利为根本动力, 其底层代码已深度内嵌追逐利益的意志, 导致资本逐利逻辑对铸魂育人逻辑发生了严重的僭越。所谓“僭越”, 并非前者完全取代了后者, 而是智能算法充当了资本逐利逻辑的执行代理, 它以一种“客观中立”或者“价值无涉”的面目, 通过技术执行层面的优先权, 持续侵蚀铸魂育人价值引领层面的实质性效力。这种僭越不仅颠覆了技术赋能教育的初衷, 更在深层结构上消解着青年价值观塑造的理性基础。在价值排序上, 智能算法将资本追逐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凌驾于铸魂育人目标的价值引领之上, 直接主导了什么内容被看见与什么内容被忽略的筛选过程。具体来讲, 智能算法通过对海量用户行为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建模, 识别并预测哪些内容最有可能触发点击、停留与转发行为, 从而实现流量变现。在此运行逻辑下, 具有高感官唤醒度、强情绪煽动性、低认知负荷特征的内容, 譬如悬念迭起的爽文式短剧、AI“魔改”视频、情绪化标题、争议

性话题、明星八卦等, 因具有天然的注意力吸附优势, 往往被判定为“高价值内容”, 从而在流量池中获得优先分发和持续加热。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真正探讨青年成长困惑、承载思想深度和价值厚度的优质内容, 因理解门槛较高、情绪唤起较难、难以在数秒之内完成完播动作, 在算法的运行逻辑中被判定“流量竞争力”不足被持续边缘化, 从而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效应。

(二) 技术偏好逻辑对多元平等逻辑的消解

智能算法虽然有不同的表现类型,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导向, 即技术偏好逻辑, 表现为“信息平台通过多种算法模型之间的交叉和配合来实现对不同用户群体的个性化推送。”^[1]智能算法将具有相似行为习惯和偏好特征的用户划归为同一信息群落, 并向其反复推送同质化的内容。表面上看, 这是智能算法满足个体需求的精准回应, 实则是一套数据将人分层归类、从而封堵异质信息渗透的运行机制, 违背了尊重主体差异、保障机会平等的多元平等逻辑。多元平等的起点, 即差异的相遇、非同质性的对话, 然而在智能算法分群的那一刻, 便已经被技术偏好逻辑悄然消解。一方面, 智能算法通过数据分层归类, 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偏差, 导致小众群体、边缘群体的需求被忽视或弱化, 这破坏了不同群体、不同需求在技术应用和资源分配中的公平性原则。这种偏差会进一步反哺技术应用的偏向性, 使技术资源向主流群体倾斜, 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 智能算法倾向于向用户推荐高度同质化的内容, 这虽然提升了用户的短期体验, 却剥夺了青年接触多样化观点, 突破自身思维惯性的机会。青年在不知不觉中被算法从多元可能的世界中“移出”, 安放于一个经验高度趋同、价值不断自证的封闭空间。在这种逻辑下, 信息茧房日益加厚, 价值共识难以在多元碰撞中形成, 反而加剧了群体极化与价值割裂。

(三) 工具理性逻辑对价值理性逻辑的压制

智能算法本质上以工具理性为准则, 其通过代码将复杂的人类价值问题简化为可计算的技术问题, 从而导致工具理性逻辑对价值理性逻辑的压制。这种压制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 而是技术发展过程中价值导向的结构性失衡, 深刻地改变着青年的精神生活和意义世界。一方面, 工具理性遵循“效率至上”的原则, 要求一切投入和产出具有“可计算性”和“可量化性”的具体指标, 这无

疑压制了价值理性所倡导的人文关怀。这种评判标准的确立,似乎宣告凡是不能被数据化和量化的价值,是不存在的或者不重要的。例如,智能算法技术致力于精准分发与流量聚合,将内容价值简化为点击率、完播率、转发率等冰冷的指标,却忽视了信息茧房、隐私泄露等伦理风险,将人异化为数据节点与消费符号,消解了价值理性所倡导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工具理性颠倒了人与技术的主客关系,催生了“异化的人”。“数据化犹如一个扭曲的镜像,其构造了一个以数据为基础的量化世界,却一定程度上遮蔽扭曲了现实世界,并用被数据化的人取代了现实中的人,导致了人的异化。”^[12]在智能算法场域中,青年不再是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人,而是被数据化、标签化的流量节点。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流量资源和曝光,逐渐习惯将“是否有用”“能否变现”“有无热度”作为衡量价值实现的优先框架,将自身价值实现异化为对数据指标的追逐和对流量的盲从。当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就意味着压制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容易导致人意义的沦丧和精神的空虚。

二、智能算法驱动下青年价值引领的现实困境

智能算法对青年价值观的冲击呈现出由外而内、由浅入深、由知到行的递进性特征,已经深度地介入青年价值认知、价值认同、价值选择与价值践行的全过程,青年价值观的窄化、虚化、物化等问题便不再只是隐约的隐忧,而是亟待正视的现实困境。

(一)价值认知困境:茧房效应加剧,导致价值“窄化”与“偏化”

价值认知,从心理层次上来讲,对应的是“知”,即知识层面,核心问题要求知不知道、不了解,它关乎青年“看到什么”“知道什么”以及“以何种认知框架理解世界”,构成价值引领的起点。智能算法迎合偏好的个性化推荐机制在提升信息获取效率的同时,也构筑起封闭的“信息茧房”,致使青年的价值认知陷入“窄化”与“偏化”的困境。一方面,在“信息茧房”的作用下,青年价值认知逐渐“窄化”。在智能算法介入之前,青年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他们通过筛选、比较、整合,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这一过程固然费力,但通过理性思维的调用,认知结构在多元信息碰撞中保持开放和弹性。然而,智能算法通过“猜你喜欢”,让青年长期处于“所见即所爱”的舒适区,

价值认知的广度在舒适区中被持续压缩,青年对世界多元可能性的感知也随之枯萎。另一方面,价值“偏化”相伴而生。“技术的迭代和青年文化寻求个性标识的诉求彼此呼应,形成了网络时代圈层化的交往。”^[13]在同类信息的反复浸染下,网络时代圈层化内部的观点在缺乏外部制衡的情况下不断极化与扭曲。算法为了增强用户粘性,往往优先推荐具有情绪煽动性、立场极端化的内容,这进一步催化了群体内的非理性共鸣。青年极易将网络时代圈层内的局部经验升格为普遍真理,将偏见视为圭臬,导致价值认知的偏移。这种认知的“窄化”和“偏化”不仅使青年在自我编织的意义网络中越陷越深,更是对主流价值的稀释和误读。

(二)价值认同困境:泛娱乐化弥漫,导致价值“轻化”与“虚化”

价值认同,即心理层面的“情感”,它指向的是“信奉什么”“被什么打动”“对什么有归属感”。一个人可以在认知层面完整地知道某种价值观,但如果内心并不真正信奉它,可以在情感上产生疏离感或抵触感。在技术迭代与资本逻辑的共谋下,泛娱乐化洪流从传播表征渗透至价值结构的深层,引发价值认同的深刻危机。其一,泛娱乐化弥漫,青年价值认同逐渐“轻化”。智能算法构建的泛娱乐化信息生态,通过瞬时情感体验和高频感官刺激,显著“轻化”了青年对严肃价值议题的情感投入,进而动摇了价值认同的情感厚度和深度。历史叙事被压缩为碎片化的“热梗”,经典文本被降维为戏谑化的“鬼畜素材”,这种“浅表化”的价值供给,消解了崇高感与严肃性,导致公众认知模式由深度反思向廉价快感滑落。持续性的娱乐浸染让价值的情感根基隐形流失,进而导致价值的深层结构单薄而脆弱。其二,泛娱乐化弥漫催生价值认同“虚化”。价值认同的牢固程度,取决于价值话语能否与个体的具体生命经验发生深切共鸣。一种价值观念若仅停留在抽象的说教层面,无法与青年求知进阶与学业规划形成有效对话,则难以完成从“外在规范”到“内在信守”的转化。当青年习惯了娱乐化叙事对世界的简化编码,那些需要复杂理解、承载张力与伦理重量的价值话语便显得格格不入,它们悬浮于青年的真实情感体验之上,成为可以复述却无法共鸣的符号。价值的“虚化”,正是在这种情感链接断裂处悄然发生的。

(三) 价值选择困境: 算法权力扩张, 导致价值“物化”与“从化”

价值选择是价值认知与认同的延伸与检验, 当青年面临多重价值冲突时, 依据何种标准进行取舍与决断, 彰显的正是价值观的实际效力。与传统算法的“工具理性”不同, “算法的社会本质就是一种权力”[4]。这种权力迥异于传统科层制下具有制度化与强制性特征的实体权力, 它不再依赖显性的行政命令, 而是“将自身的强制性特征隐形化, 显现出商业逻辑、偏好原则、技术理性和隐性运行的特征。”[5]使青年价值选择陷入“物化”与“从化”的双重困境。先论“物化”。在智能算法的量化世界里, 一切都被转化为可计算、可比较、可排序的数据单元。这种可量化逻辑原本服务于内容分发, 却在青年的日常使用中逐渐溢出, 成为他们衡量事物价值乃至人生价值的框架。学业成就被简化为绩点与排名, 职业前景被等同于薪资数字, 社交关系被量化为点赞数与粉丝量, 甚至个人的兴趣、审美与情感表达, 也被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标签所收编。青年不再以内在的意义感知来确认价值, 而是以外在的数量指标来兑换价值, 将人的价值等同于物的价值。再论“从化”, 智能算法权力的另一重面相, 是以“智能推荐”的方式隐性接管了青年的选择路径。无论是看什么内容、追逐什么潮流、模仿何种生活方式, 算法都以“猜你喜欢”“大家都在看”“与你相似的人选择了”等形式, 青年在此过程中体验到的不是被强制, 而是被理解、被服务。“从化”的实质则是: 不是智能算法替青年选择了什么, 而是青年逐渐丧失了价值选择的能力与勇气, 沦为接受算法投喂的客体。

(四) 价值践行困境: 即时满足成瘾, 导致价值“韧性”不足与行为“退化”

在算法推送、无限下拉和“秒回”生态共同编织的数字环境中, 青年个体日益陷入一种高频率、低成本的满足感循环, 并对此产生深度成瘾。这种即时满足成瘾, 不仅弱化了个体抵御诱惑的心理能量, 更从根本上瓦解了价值践行的长效动力机制, 致使青年在价值塑造上呈现“韧性”不足, 在实践行动上出现“退化”现象。价值“韧性”, 是指一种深层的心理弹性, 是个体的核心

价值观在诱惑、挫折等外部因素冲击下不断裂, 是受扰动后仍然能够保持核心价值观不被置换、持续自我修复并调节的内在行为。它需要在一次次延迟满足、克服冲动的反复践行中获得锻炼, 如同肌肉需要抗阻训练一样。即时满足的机制以几乎无缝衔接的快乐供给, 将想要与得到之间的时间差压缩至近乎消失。当个体已经习惯满足成瘾, 便会对需要付出持续努力才会获得回报的深层价值丧失耐心, 产生回避甚至厌倦的心态, 造成稍遇现实阻力便发生价值动摇或信念崩塌。价值“韧性”不足的核心正是价值观从稳定的心理结构内层, 向外围的、易变的认知标签的漂移。这种状态直接映射于行为层面, 体现为一种清晰的“退化”轨迹。行为“退化”表现为价值观在实践践行层面行动意愿的实质性萎缩。在即时满足的裹挟下, 青年“指尖上的勤奋”掩盖了“大脑中的懒惰”, 使得知行关系发生断裂, 即青年虽然掌握了丰富的价值理念, 却因缺乏将理念转化为行动的意志力与实操机会, 陷入“高认知、低行动”的实践性贫困。

三、智能算法驱动下青年价值引领的纾解路径

智能算法驱动下青年价值引领的出现多重现实困境, 纾解之道无法靠单点修补或施策, 而需构建“技术—制度—主体”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格局。其中, 技术向善是源头活水, 提供抵达之力; 制度规约是刚性防线, 守护前行之路; 主体觉醒为最终归宿, 赋予青年成长的方向和意义。三者层层递进、互为支撑, 共同铺就智能算法驱动下青年价值引领的纾解通路。

(一) 技术向善: 优化算法核心技术, 增强主流价值定向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 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 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6]要遏制智能算法因技术发展所诱发的意义危机, 防止主流价值秩序的边缘化, 应对之道不在于技术的克制, 而是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锚定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坚持技术向善原则。也就是说, 正确认识和运用智能算法引领青年价值, 首要的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设定为技术运行的唯一价值航向, 矫正其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偏差, 确保

智能算法技术发展为青年价值观的引领服务,让技术助力成长成才。首先,在内容池准入与分发排序机制中,引入主流价值权重因子。譬如,运用自然语言处理、语义分析等技术,提升对主流价值内容的机器识别精度,并在推荐排序中赋予更高的基准权重,使优质内容在流量竞争中具备优势,打破“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效应。其次,建立信息多样性的强制性干预机制。譬如,在个性化的推荐中,保持一定比例的异质内容与公共议题曝光量。这种强制性的设计并非对个性化推送的否定,而是通过注入必要的多样性的信息,使智能算法在满足个体需求的同时,也承担起破除信息茧房、拓展认知边界、保障信息多元化的社会责任,为青年价值认知的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技术保障。

(二) 制度规约:完善算法治理体系,筑牢价值引领的制度防

智能算法的应用应是解放人、服务人,而非束缚人、捆绑人。当技术红利归资本所有,而价值迷失和不确定风险则由社会承担,这样的技术即便再先进,也称不上真正的智能。智能算法是价值传导的重要载体,是青年认知世界的通道,而非精神垃圾场,因而其运行逻辑必须受制于制度框架的刚性规约。一是明确智能算法治理的法律规范体系的价值底线。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为加强算法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持,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多侧重于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对智能算法的价值规约相对不足。因而,应该明确将主流价值导向写入智能算法推荐的运行原则,确立算法不得逾越的红线和底线,识别并修正可能存在的偏见与歧视,以主流价值凝聚思想共识,对违背公序良俗的负向价值导向实施一票否决。二是建立全链条监督和问责机制,构建“前端审查—中端监测—末端问责”的全链条监管责任闭环,以制度刚性倒逼平台企业从“他律”转向“自律”的根本转变。具体而言,在前端,实施智能算法备案与安全评估制度,要求算法研发者和平台方披露算法的核心运作逻辑,赋予青年群体对算法推荐的“解释权”与“申诉权”,打破技术黑箱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在中端,建立实时监测预警系统,对异常流量与诱导性推送进

行精准拦截,防止青年价值观偏轨;在末端,落实问责制,加大惩戒力度,提高违规成本,形成“不敢违、不能违、不想违”的高压态势,从而筑牢抵御青年价值异化的制度堤坝。

(三) 主体赋能:激活内生动力,实现知行合一的自觉转化

技术治理和制度规约为青年价值引领提供了外部保障,但要真正实现“外部约束”向“内生秩序”的跨越,必须回归主体维度。主体赋能,即激活青年的主体意识,使其从智能算法投喂的“被动客体”成长为价值选择的“能动主体”,帮助青年完成“要我认同”到“我要认同”“我要践行”的深刻转变。一是以认知素养夯实理性根基。应当加强算法素养教育,将智能算法推荐背后的商业逻辑、权力属性、基本特征等内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融入学校课程和社会教育,帮助青年为算法技术祛魅,揭开智能算法运行的神秘面纱。唯有教育青年明晰智能算法“为何推荐”“如何推荐”,才能破除其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在认知层面提升算法素养,重建理性判断的能力,为价值自觉奠定理性根基。二是以情感素养涵养价值认同。价值引领要入脑入心,仅停留在“知”的层面是不行的,还须打通“情”的通道。“文化作为主体性确立的重要因素,是数字青年精神存在维度的重要表现方式。”^[7]应当充分运用中华文化中的丰厚资源,以直抵人心的叙事方式将真挚的情感与远大的理想内化为青年深切的认同,进而唤起其对崇高意义的深层共情与自觉向往。当青年在情感上与家国情怀、时代使命、艰苦奋斗等价值内核产生深切共鸣,那种由智能算法制造的即时满足的娱乐快感变相形见绌,内生性的价值认同由此生发。三是强化具身实践与价值确证。要引导青年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文化传承等真实情境中反复锤炼,在具身实践中检验和确证主流价值的真理力量。通过将宏大的价值引领转化为个体可感可知的具身体验,正确的价值观便不再是外部灌输的教条,而是内心自觉生发的必然选择,最终实现主体的回归,实现知行合一的自我超越。

参考文献:

- [1] 张林.智能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治理[J].探索,2021,(1):176-188.

[2] 余杰.智能算法下网络价值引导的四重反思[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11):119-126.

[3] 罗小茗.圈层—既要有特色,也要有共识[N].人民日报,2020-05-08.

[4] 喻国明,杨莹莹,闫巧妹.算法即权力:算法范式在新闻传播中的权力革命[J].编辑之友,2018,(5):5-12.

[5] 张爱军,李圆.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权力:逻辑、风险及规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6):18-24+109.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7] 靳玉军,王梦蝶.青年数字化生存的主体性审思[J].思想理论教育,2026,(4):96-103.